教育如何“本土化”：徐旭生对近代中国教育困境的批判与重构

刘　飞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DOI：10.65285/JYXSY.V1I2.007

摘　要：1930 年代，中国教育深陷西化移植与传统桎梏之中。徐旭生从制度与文化两个层面批判教育困境：制度层面表现为移植错配与城乡对立，文化层面表现为功能异化与书本至上，两者共同指向教育与社会的脱节。他主张教育须立足农业社会经济基础，以社会需求为纲，构建以三级学制和半耕半读模式为核心的本土化方案。在与“全盘西化”及“以工立国”者的思想交锋中，徐旭生既拒绝盲目移植，也不固守传统，而是开辟了一条以制度重构为路径、以农业社会为基底的本土化教育道路。
关键词：徐旭生；教育批判；本土化教育方案

How to “Localize” Education: Xu Xusheng’s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Dilemma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Fei Li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1930s, Chinese education was caught between the transplantation of Western model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 Xu Xusheng criticized the educational dilemma from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ly, the problems lay in inappropriate transplantation and urban-rural division; culturally, they were reflected in functional alienation and book-centered orientation. Both issues led to the separation of education from society. He held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oriented toward social demands, and put forward a localization scheme centered on the three-level school system and the work-study model of half farming and half studying. In the ideological debates with advocates of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 nation-building, Xu Xusheng rejected blind transplantation as well as rigid adherence to tradition. He explored a localized educational path featured by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rooted in agricultural society.
Keywords: Xu Xusheng; educational critique; localized education scheme

前言：

1930 年代，中国教育界围绕现代化路径展开论争。徐旭生（1888—1976）在《教育罪言》系列中批评教育与中国社会基础脱节，主张教育应立足中国农业社会实际。本文以“本土化”概括这一主张。

既有研究多关注其在考古学、古史领域的贡献，对其教育思想着墨不多，且多将其归入“乡村教育”思潮；至于他在与“全盘西化”“以工立国”论者交锋中，从“制度与社会”关系入手诊断教育问题的独特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本文即以徐旭生的教育本土化思想为对象，讨论两个问题：他如何从“制度与社会”关系诊断教育困境，又如何以农业社会为基底设计改革方案，并据此厘定其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位置。

一、批判：教育困境的两个层面

徐旭生从制度与文化两个层面对教育展开诊断：制度层面表现为移植错配与城乡对立，文化层面表现为功能异化与书本至上。两者相互支撑，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教育与社会的脱节。

（一）制度层面：移植错配与城乡对立

徐旭生批评近代中国教育盲目移植西方模式，使教育沦为西方学术的“附庸”。他认为，若贸然拿“在外国所学的法子实用于中国”[1]，必闹笑话。他对比中西课程：巴黎大学理科学生三年完成数学、理化、博物三组课程即可毕业，中国学生则需四年修满数十门学分，过度细化的课程抑制了研究能力。[2] 他还指出，社会科学的地方色彩更浓，在外国所学方法“所能用的，不过百分之八九十”，结论能实用于中国的“顶多也不过百分之四五十”[1]。至于留学归国者，“不作调查，不作研究，就想把他所学的原封不动，照样教授或实用于中国”[1]，这正说明制度移植与农业社会基础之间已经断裂。

徐旭生还借用梁漱溟对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的区分，将当时的教育制度界定为都市教育制度。[3] 学校、师资和经费集中于大城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被排斥在外。乡村教育照搬都市模式，知识与农业生产无关，与中国“以农为本”的社会格局错位。学校集中于都市，意味着知识、

权力与上升通道的城市化。农村子弟一旦接受这套教育，所学便指向都市生活方式与职业路径，毕业后不愿回乡。教育非但未成为沟通城乡的桥梁，反而成为抽空农村人才、强化城乡分隔的力量。这一后果反过来强化了制度移植的惯性，使教育的“本土化”更难进入议事日程。

（二）文化层面：功能异化与书本至上

徐旭生把教育功能的异化一直追到孔子时代。他认为“学也，禄在其中矣”[1]一语，将读书和安富尊荣绑在了一起。他反问：“科举变而学校，换汤又何尝换药？”[1]形式换了，功能没换。他用“做官教育”来统称新旧教育，意思是这套从工业文明搬来的学校，被中国社会结构吸收进了士大夫再生产的轨道。结果就是“新剥削阶级”[4]的出现。这不是哪个学生道德堕落的问题，而是制度在成批地制造一个既无法也不愿回到生产中的寄生群体。课程、升学、就业，没有一样指向农村；而学生从入学那天起，就已经泡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里了。教育要“本土化”，这个“文化—制度”结构就必须一起打破。

同样，徐旭生对只重书本、不重自然观察的学风也有批评。他打了个比方：书籍就像实践探索的“旅行指南”，可以指路，但路还得自己走，观察还得自己做。他还说，中国学人的问题不光是缺少自然观察，抽象思维也不发达，纯粹数学、论理学这些抽象科学在中国始终没有发展起来。[1]所以，他提倡的教育“本土化”，不是简单地把课堂搬到乡下、把书本拉回自然，而是想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养出一种新风气：既看重具体经验，也不丢开抽象思辨。

诊断之后，徐旭生要回答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他的方案以“本土化”为核心，想让教育重新扎根到乡土社会里去。

二、方案：本土化教育的构想

徐旭生的方案经历了从“新书院”局部改良到《教育罪言》中设计的转变，这表明：改良无法触动“文化——制度”的结构，唯有以农业社会为基底重新设计教育体系，才能使教育真正“本土化”。

（一）从“新书院”到三级学制

在193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时代论争中[5]，徐旭生的立场与梁漱溟等人相近，却并不完全排斥工商业。他主张教育因地制宜，先确立农业的优先地位。

徐旭生本土化思想的雏形，是1931年在北大哲学会演讲中提出的“新书院”方案。在他看来，大学教育已趋于机械僵化，学生缺乏独立研究的能力。他因此主张在现行学制之外另设书院，打通文理，把农事劳作与学术研究放在一起，以半耕半读推动教育的平民化与实用化。[6]然而新书院方案提出不久，徐旭生便因争取教育经费受挫，愤而辞职。“九一八”事变随即爆发，个人挫折与民族危机叠加，使他对补充式改良的局限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本土化教育不能只做制度的补丁，而必须另起炉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旭生在《教育罪言》中提出以“本土化”为核心的改革原则。在他看来，科举旧制与移植自西方的学校制度，都与中国农业社会的实际相错位，因此既不能修补，也不能照搬，只能舍弃旧模式，重新设计一套切合中国农业社会的教育体系。[2]他特别强调，教育须以社会需求为纲，人才培养要与社会实际相匹配。在制度设计上，他主张简化层级，建立三级体系：“儿童两岁至六岁受幼儿教育，六岁至十五岁受国民教育，十五岁以上为高等教育”[7]，以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实用型人才。

幼儿教育阶段，设乡村幼儿园，实行集体养育，以解放家庭劳动力。国民教育阶段是改革的核心，重点在教育与农业生产的结合：师范学校设在乡野，配套建设农场，学生兼具“农夫”与“学者”双重身份，遵循“农忙务农、农闲治学”的原则，费用由国家承担，毕业后服务地方教育。[7]高等教育阶段划分为侧重实用的专门教育与侧重理论的大学教育，前者靠近产业区域以便实习，后者以研究室为中心注重理论研究。

上述设想构成徐旭生教育本土化思想的基本框架。其核心是教育须与农业生产、乡村生活相衔接，培养本土所需人才。他既反对照搬西方，也不赞成固守传统，而是试图在两者之外另辟路径。

（二）补充与反思：本土化构想的深化

徐旭生的方案在当时应者寥寥。1936年，他在《教育刍议》中坦承，方案“虽说没有很多人反对，真正赞成的人却仍是很少”[8]。他将此归因于两点：一是实施起来确有现实难度，二是士大夫阶层对根本变革心存拒斥。

也正是在《教育刍议》中，他把方案又往前推了一步。他反对把中学集中在大城市，主张“如果能移之于农村固佳，就是不能，也要给它宜做校址”[8]，校舍则“力戒华丽”，建筑风格要与农村环境相协调。他还提出把学术旅行纳入课程，认为“旅行对于知识的获得关系太深”[8]，应组织初中高年级及高中学生实地考察，由师生共同整理调查资料，形成可以公开发表的成果，让知识生产真正扎在乡土经验里。

这套方案在理论上回应了前文所诊断的教育困境。当徐旭生把它公之于众后，《独立评论》等刊物很快成为论争的阵地，讨论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三、回响：方案的论争

1932年11月，徐旭生在《独立评论》发表《教育罪言（一）》，以“罪言”为名直指教育积弊。不过，当讨论从“诊断”推进到“方案”时，共识很快消失。

（一）路径之辩：与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交锋

第一层论争围绕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展开，焦点是“移植”还是“本土化”。徐旭生从批判走向建构时，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对其发难。陈序经持“全盘西化”立场，认为：

“假使中国教育而像旭生先生所说的要农村化，则这个农村化，还是要现代的，或西洋的农村化；决不是，而且决不应该要中国固有的农村化。”[9]

在陈序经看来，任何强调“本土化”或“农村化”的主张，都不免有为落后辩护、阻碍彻底现代化的危险。

徐旭生的回应直指要害：

“我推论中国教育从孔子起就开始走到错路上，而陈先生却疑惑我提倡数千年已有的农村化，岂不是咄咄怪事……我个人并没有用中国化这一个词，并且也毫没有复古的意思。”[10]

他指出，盲目抄袭西方教育体系的最大弊病，在于与中国农业国情脱节，而陈序经所主张的“全盘西化”，正是这一弊病的极端表现。由此可见，徐旭生的目的是探索一条立足本土的现代化路径，而非延续传统。

（二）经济基础之辩：与吴景超“以工立国”论的交锋

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的质疑，把论争推进到经济基础层面。他肯定徐旭生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但认为“要使全国的教育农业化，就未免‘矫枉过正’”[11]。其核心论据是：当时中国农业人口虽占多数，但从长远看，农业技术进步必然导致农业人口减少，国家发展的方向在于工业化与都市化。

徐旭生首先认可其“主张在市中的国民学校与师范学校附设工厂”[10]的见解。但认为“即使承认中国应该尽全力发展工商业，而过渡时代，这样的教育制度也万不能用。”[10]由此，他提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设想：工业分散于小城镇，与农村形成互补，最终实现“人人可以进去工作，工作每日五六小时即足，余暇入图书馆实验室探求新知识”[10]的理想社会。

可见，徐旭生的方案是一种基于“转型期”的阶段性策略，并非要把农业社会永久固化。

结语：

徐旭生在《教育罪言》中批评当时的教育制度全盘西化，脱离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他以“教育不能离社会经济而独立”为基本判断，从制度和文化两面指出问题：制度上是移植错配、城乡对立，文化上是功能异化、书本至上，归根结底都是教育与社会脱节。针对这些，他提出一套本土化改革方案，原则是立足本土、以社会需求为纲，核心是三级学制和半耕半读，目的是让教育重新和乡土社会接上关系。

这套方案最终未能广泛推行，原因不止一端。乡村破产使“半耕半读”失去物质基础；国民政府既无力也无心把经费投向乡村；而读书离农的普遍心态，又与回归乡土的教育设计相冲突。尽管如此，徐旭生从“制度与社会”关系入手思考教育问题，并探索教育本土化的路径，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仍是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独特节点。

参考文献：

[1] 徐旭生 . 教育罪言 (四)[J]. 独立评论 ,1933(33):6−12.

[2] 徐旭生 . 徐旭生文集 : 第三册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21.

[3] 徐旭生 . 教育罪言 (五续)[J]. 独立评论 ,1933(37):16−21.

[4] 徐旭生 . 教育罪言 (二)[J]. 独立评论 ,1932(27):10−15.

[5] 郑大华 . 民国思想史论 [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 徐炳昶 . 教育制度之讨论 : 现时中国教育制度问题 [J]. 新社会 ,1931,1(8):203−207.

[7] 徐旭生 . 教育罪言 (六续)[J]. 独立评论 ,1933(38):5−11.

[8] 徐旭生 . 教育刍议 [J]. 中华教育界 ,1936,23(12):99−103.

[9] 陈序经 . 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 [J]. 独立评论 ,1933(43):6−12.

[10] 徐旭生 . 教育与其他 (西安通信之二)[J]. 独立评论 ,1933(54):15−19.

[11] 吴景超 . 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 [J]. 独立评论 ,1933(40):5−10.

作者简介：刘飞（2000 年 −）、男、汉族、安徽六安、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